

擦亮天津红色文化底色

王永立 康晶晶

津派文化大家谈

红色江山,热血浸染;红色血脉,永续相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通过实践创造并不断积淀升华形成的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精神文化体系。天津红色文化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红色文化的普遍性特征,更独具津沽地域特色。新征程上,进一步传承和保护天津红色资源,擦亮津门红色文化底色,对于实现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塑造城市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红色文化的生成由来

天津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记录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旭日东升,承载着“觉悟、革新”的五四风云,铭刻着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铭记着“百个第一”的发展辉煌,讲述着“开发区大有希望”的创业故事,书写着深入落实“三个着力”和“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恢弘篇章。据2023年统计,全市共有红色资源360处,其中:旧址遗址312处,纪念场馆24处,烈士陵园14处,其他设施10处。这些红色资源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天津红色资源和红色文化生成由来看,它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丰沃土壤,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源头活水,在历史沧桑巨变中积淀了深厚的底蕴,照亮了栉风沐雨、矢志奋斗之路。

红色文化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魂脉。红色文化的形成,发展内含于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中体现出先进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红色文化的思想灵魂和信仰支柱,在红色文化的孕育形成中始终发挥着根本指导作用。革命行动从哪里开始,红色文化就从哪里生发。五四运动前后,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在津读书学习的周恩来、张太雷、于方舟、于树德等青年学生,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从接触到接受再到决心为之而奋斗终生的历程。1920年10月,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张太雷在李大钊指导下创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9月,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在津创建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天津党组织宣告诞生。自此开始,天津党组织团结带领全市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天津红色文化也从萌发到逐步丰富发展,成为流淌在天津城市血脉中宝贵的红色基因。

红色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丰沃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鲜明的特质体现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国品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中国操守;“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的中国高度;“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的中国格调;“不论穷达生死,直节贯殊途”的中国气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国气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抱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中国气度;“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中国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国情怀,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上述鲜明特质,深深植入国人的血脉,为红色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丰沃土壤,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周恩来“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远大抱负,张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革命气概,于方舟“以己为舟济苍生”的为民情怀,吉鸿昌“为时代而牺牲”的崇高境界,等等,就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天津红色文化中的精华和亮点。

红色文化以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源头活水。党的百余年奋斗征程在天津留下了辉煌的浴血奋战史、艰苦创业史和改革创新史,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红色文化是天津文化最鲜明的底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天津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迎来天津解放和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天津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天津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入推进经济体制等各项改革,推动天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天津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 and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启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这些生动实践和经验,为天津红色文化生成提供了鲜活素材和源头活水。

天津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

历史川流不息,文化代代相传。每一处红色资源,都是党的历史见证。天津红色文化中

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城市红色血脉之中,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历史传承,为我们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提供了丰厚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

追寻真理的坚定信念。天津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青年时代在天津求学6年,后多次返回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天津地方党团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五四运动期间,以周恩来、邓颖超、张太雷、于方舟为代表的先进青年建立觉悟社、新生社等进步团体,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成长为信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天津成为全国较早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天津红色文化由此萌发。

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担当。天津是大革命时期党领导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 centers 所在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相继在天津建立中共顺直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等领导中枢,领导北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开创党在北方革命运动新局面,天津红色文化在革命斗争中不断丰富发展。

英勇斗争的品格风骨。天津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天津人民同仇敌忾、不畏艰险,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付出巨大民族牺牲,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艰苦斗争,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钳制消耗大量日伪军兵力,有力削弱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吉鸿昌、包森、田野等一大批抗日英烈,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为天津红色文化注入丰富内涵和独特品格。

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天津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城市攻坚地。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人民解放军在天津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配合下,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和舍生忘死

的革命意志,仅用29个小时就攻克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工事,使天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天津的解放为红色文化的丰富发展增添了血染的风采。

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天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发展生产的先行地。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旧中国留下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团结带领全市人民认真贯彻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变革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经济秩序,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使国民经济重获新生,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这些丰富实践为天津红色文化增添了光辉篇章。

敢闯敢试的豪迈情怀。天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希望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了从盐碱滩涂到国际一流现代化产业新城的历史性跨越,绘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卷。1986年8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天津,对天津改革开放和开发区建设给予充分肯定,欣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总设计师的殷殷寄语,始终激励天津人民以更大决心和力度,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守正创新的进取精神。天津是践行“四个善作善成”重要要求的实践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天津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五次到天津视察指导、出席活动,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天津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天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新征程天津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充分发挥顽强拼搏、守正创新的进取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战略牵引,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进“四个善作善成”,正在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恢弘篇章,进一步促进了天津红色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激发全市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延安五老”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楷模

魏继昆 陈春兰

“延安五老”,是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的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五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即1940年1月毛泽东在吴玉章寿辰的“祝词”中所说的,很受青年人欢迎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这五位长者经历非凡,是全党学习的杰出楷模。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自1840年以来,在西方列强的侵凌之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如何挽救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我中华重新振兴呢? 对此无数仁人志士都在上下求索,探寻中华振兴之道,而“延安五老”就是其中的艰辛探索者。他们大都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年长者。如吴玉章出生于1878年,林伯渠出生于1886年,徐特立出生于1877年,董必武出生于1886年,谢觉哉出生于1884年。自步入社会以来,他们历经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等。特别是在中国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实现救国救民的根本问题上,“延安五老”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了振兴中华的艰辛探索。如1941年吴玉章回忆道:“我是经过了变法维新、排满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一直到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民主革命而言,“延安五老”的艰辛探索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中国甲午战败至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突出地体现为,同情支持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面对中华民族危机加深、清政府腐败无能,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延安五老”,以切

实行动投身于挽救民族危机之中,尤其是对维新变法深表同情和支持。正如徐特立后来回忆,在其青年时期,遇到维新变法失败,作为“康梁的信徒”,自己受到“非常大的刺激”。吴玉章更认为自己是戊戌变法“新政的宣传者”。此时的“延安五老”都同情支持维新变法,企盼通过改良使中华再次振兴。

第二阶段,从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突出地体现为,坚定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乃至后来的北洋政府皆腐败无能,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的“延安五老”正值青壮年时期,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救国救民为首要目标,纷纷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如留学日本的吴玉章,首先加入同盟会,助力辛亥革命,并以“革命必胜”的自信心进行了许多艰苦的工作”。林伯渠也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中华革命党,致力于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而加入同盟会后的董必武则以不惧牺牲的勇敢行动,直接投身于武昌起义的推进中。所有这些都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阶段,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突出地体现为,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十月

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和推动下,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延安五老”在深入探求中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改造中国的新的领导力量,找到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新的思想武器,在中国革命斗争中,他们实现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性跨越。正如朱德对徐特立评价所言,在几经选择中,最终“一直跑到了共产主义的营垒来,做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老战士”。其他几位也相继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董必武作为党的“一大”代表,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他们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延安五老”的非凡经历,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缩影。历史证明,他们以其卓越贡献和不朽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投身伟大事业的杰出楷模。

第一,“延安五老”是把握历史大势、实现与时俱进的杰出楷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在改造世界中,只要把握历史规律及其发展大势,做到顺势而为,我们就能更好地前进。在对十月革命伟大事件的探究中,“延安五老”率先觉察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洞见了人类文明的新曙光。其中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

就深入探究了十月革命与世界发展大势的内在关联,他们认定,十月革命“开世界革命的先河,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起点”。因而在历经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曲折后,他们深入地探究了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如吴玉章就认为,十月革命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强调“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正因如此,他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誓做“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人”。

第二,“延安五老”是勇于自我批评、坚持自我革命的杰出楷模。“延安五老”之所以不忘使命担当,坚持与时俱进,其根本在于他们的内在动力强劲,特别是主观世界改造得彻底。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尝试。在此过程中,“延安五老”就着力反思自己的党性修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深入开展自我批评。其中徐特立在党的高干会议上,更是敢于自我亮剑,“对自己过去在思想上产生过,但不为别人所知的错误公开地进行自我暴露和剖析”。吴玉章也著文认为,“用自我批评来纪念我党十九周年和抗战三周年,是锻炼我们自己力量以求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最好方法”。董必武更认为整风是一场“思想革命”。所有这些都表明,“延安五老”勇于自我批评,具有深厚的思想根基和强劲的内在动力,他们是当之

无愧的开展自我革命的杰出楷模。

第三,“延安五老”是作风优良、人格高尚的杰出楷模。共产党人不仅要有真理力量,也要有人格力量。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延安五老”以党的优良作风,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力量。具体说来,主要是:其一,“延安五老”是言行一致的楷模。比如徐特立,既口能言之,又身能行之,是言行一致的革命家。对此在其六十诞辰之际毛泽东赞扬徐老:“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其二,“延安五老”是不惧艰难的楷模。在“延安五老”中,除一人因在境外为党工作,其余四人都历经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苦考验,深知中国革命的伟大和艰难。对此朱德特别称赞徐特立等是“耐劳耐苦的模范”。其三,“延安五老”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革命楷模。1940年1月,毛泽东在吴玉章寿辰的“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特别是“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毛泽东认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的人”,因而“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其四,“延安五老”是公而忘私、他而忘己的楷模。如何处理好公与私、他与己的关系,是检验共产党人党性觉悟尤其是道德人格的核心指标。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他与己的关系,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自己第一”。而在此方面,“延安五老”则作出了表率,成为全党的杰出楷模。正如1937年1月毛泽东致信徐特立所言,与那些人相反,“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作者分别为天津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